

《八阵合变图说》考辨

潘文竹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 山东 济南 250100)

摘要:《八阵合变图说》是明正德年间产生的一部演绎诸葛八阵之法的兵书,在陕西官兵抵御四川民众起义进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综考今存文献可知,该书为时任陕西巡抚的山东即墨人蓝章与其幕士、甘肃武都人龙正合作的“职务作品”,其署名当作“明即墨蓝章学武都龙正参”或“明蓝章撰,龙正演注”;初刊于陕西汉中而非“蜀中”,具体事宜由时任汉中郡守的四川邻水人杨秉衡负责。《八阵合变图说》的今存版本,可划分为明正德十一年(1516)高朝用刻本、万历年黄邦彦刻《诸葛武侯心书》本和清嘉庆间张海鹏刻《学津讨原》本三个系统;其中,张刻本与四库馆臣所见“两淮盐政采进本”同源,因有“明龙正撰”等相同讹误。

关键词:《四库全书总目》;《八阵合变图说》;蓝章;龙正;版本

中图分类号: G256.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7110(2020)03-0130-10

《八阵合变图说》是明正德年间出现的一部据诸葛武侯八阵遗迹演绎而成的兵书,在当时陕西官兵镇压四川民众起义的过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也是我国古代军事史上为数不多的以训练和实战效果而闻名的兵书。清人汇纂《四库全书》时虽未全文收录,却录其目于《四库全书总目》“兵家类存目”47部之中;现代学者亦给以极高评价,甚至以其为“自三国以至明代八阵图变化阵形的历史脉络”中极为重要的第3次演变^①。然而由于应用范围不广、古人著作权意识不强、年湮代远等主客观因素,这部由官方初刊、一度有效提升明军战斗力的兵书,至清乾隆编撰《四库全书总目》时即产生了一些令普通读者难以辨识的讹误。令人忧虑的是,在信息资源如此丰富、传播技术如此发达的今天,这些讹误不仅仍然存在,且在更加广泛地传播。因此,本文拟以《四库全书总目·八阵合变图说提要》为切入点,对《八阵合变图说》的著者、刊刻、版本等情况略加考辨,以免贻误后人。

一、著刊考

关于该书,四库馆臣著录曰:“《八阵合变图说》,无卷数,两淮盐政采进本。明龙正撰。正,武都人。正德中,莱阳蓝章巡抚四川,驻兵汉中,遣人至鱼复江,图八阵垒石。正时在章幕中,遂推演为图说,

基金项目: 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委托项目“大英图书馆所藏中文古籍的整理与文献学研究”(17JZDW04)、青岛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八阵合变图说》考辨”(QDSKL190110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潘文竹,女,山东胶州人,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博士生,青岛大学东方论坛编辑部编辑,主要从事目录版本和文学文献研究。

^① 熊笃、段庸生:《〈三国演义〉与传统文化溯源研究》,重庆:重庆出版社,2002年,第193页。

刊于蜀中。”^① 自从《四库全书总目》流通以来,此著录渐成定论。然细读此书之今存版本和相关文献,即可知四库馆臣之疏漏。

(一) 著者考

“明龙正撰”的说法,自《四库全书总目》成书以来似成定论。如清张海鹏辑《学津讨原》、今人编《丛书集成初编》《丛书集成新编》《续修四库全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中国兵书集成》等,均将该书著者署作“明龙正撰”;《中国兵书通览》《名著通览》等普及性较强的现代读物以及众多传播性更强的网络介绍性文章,也大多如此标注。然而,细考此书的早期版本及相关文献可以发现,此说法未免偏颇。

首先,今存《八阵合变图说》各版本中,刊刻时间较早的应是明正德十一年(1516)高朝用刻本(以下简称“高刻本”),今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河北省图书馆、贵州省图书馆、台湾“中央图书馆”、即墨市档案馆等处均有收藏。其中,贵州省图藏本品相最佳,已收录于“第二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编号为04505);国图藏本(善本书号13120)次之,其它各本虽品相欠佳,或有缺损,然皆前有“正德丙子(1516)春二月吉旦”徐昂^②作《八阵合变图说叙》(以下简称“徐《叙》”),后附“正德八年癸酉(1513)仲夏既望”蓝章作《八阵图跋》(以下简称“蓝《跋》”);且均署作“明即墨蓝章学武都龙正参”。

蓝章(1453—1525),字文绣,自号大劳山翁,山东即墨人,明成化二十年(1484)甲辰科进士,历婺源知县、潜山知县、太仆寺少卿、都察院佥都御史等职;正德二年(1507),时任都察院佥都御史(职级正四品)的蓝章,因忤权宦刘瑾而被诬下狱,出狱后谪为抚州(今属江西)通判(正六品),寻改陕西佥事(正五品),提兵金州(今陕西省安康市一带),“抚治商洛道”;五年,因四川鄯本恕、蓝廷瑞起义波及陕西而被重新起用为都察院佥都御史(正四品),巡抚陕西;正德八年十二月,以平蜀民起义之功而升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迁南京刑部右侍郎(正三品);次年三月,离陕赴任;十年八月,奉敕清理两淮、长芦等处盐法;十二年(1517),屡疏乞休,致仕而归;嘉靖四年(1525)十二月初二日,卒于乡;嘉靖十二年(1533)六月,获赐葬之荣,官为督造莹兆于即墨邑北;事见《明史》《即墨县志》及《即墨蓝氏家乘》《蓝司寇公劳山遗稿》等。因知《四库全书总目》“莱阳蓝章巡抚四川”一语而有两处讹误。一是误以蓝章隶籍莱阳。莱阳,旧称昌阳,两汉时隶属于青州东莱郡长广县,曾辖即墨一地,然为时极短;明清时属山东布政司登州府,今属山东省烟台市。而蓝章籍贯,今存史籍、方志等均明确记载为即墨;即墨在两汉时曾隶属于东莱郡长广县,自明洪武九年(1376)始,属山东布政司莱州府,今属山东省青岛市。则明代即墨人蓝章,应隶籍“山东布政司莱州府莱州”而非“山东布政司登州府莱阳”。二是误以蓝章“巡抚四川”。如前所述,蓝章于正德二三年间贬为陕西佥事,五年以四川民乱而官复原职、巡抚陕西,八年十二月迁为南京刑部右侍郎,次年三月离陕;其在陕西为官近七年之久,然从未就职于四川。而四库馆臣的“巡抚四川”之误,或因不明其时陕西、湖广驻军均参与平抚四川民乱一事而致。据此,“莱阳蓝章巡抚四川”一语,实应改作“即墨(或莱州)蓝章巡抚陕西”。

关于龙正的今存文献较少,其中比较详细者,当属均编定于清乾隆元年(1736)的《甘肃通志》《直

① 永瑢:《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833页。

② 徐昂,字文举,扬州泰兴人,明弘治九年(1496)进士,初授兵部给事中;正德初,因忤宦官而罢官闲居;嘉靖初,重获起用,官至广东布政司右参议,事见雍正《扬州府志》卷二十九。

隶阶州志》的此二文段:

明龙正,阶州人,幼英敏过人,精于易学;遇金牌道人,传授六壬,占验(验)多应。正德壬申,蜀寇猖獗,都御史召之赞画,每战多捷。番夷入寇,总督聘居帷幄,出奇数胜,欲授以官,不受,奏赐金帛冠带。后总督杨、张、邓征聘,皆不就。所著有《八阵图》《太乙成局》《奇门集要》《六壬书》。^①

龙正,举人龙光之弟。幼英敏过人,受《易》于陈主事,精于《易》学。遇金牌道人,传授《六壬密书》,占验推步多应。正德壬申,蜀寇猖獗,督御史黄公、蓝公皆召赞画,每战多捷。匈奴入寇,总督聘取帷幄,出奇致胜,欲授以官,不受。奏赐金帛数十杠,一品官服并狮蛮带。后,总督尚书杨公、张公、邓公交章征辟,不就。所著有《八阵图》《太乙成局》《奇门集要》《六壬书》。^②

此二文大同小异,疑当同源。其中的“正德壬申”,即正德七年(1512);“蜀寇猖獗”,应指四川起义军在廖麻子、喻老人二人领导下再度兴起一事;“都(或督)御史”,即“巡抚陕西都御史”,应指正德五至八年间以都御史身份巡抚陕西的蓝章;“总督”,当指明中后期设置的总理陕西及其西北部甘肃、宁夏、延绥等地军务的“陕西三边总督”。明正德间任“陕西三边总督”者,清雍正《山西通志》卷二十二载有才宽(正德四年)、杨一清(正德五年)、张泰(正德六年)、彭泽(正德八年)、邓璋(正德九年)等5人,雍正《甘肃通志》卷二十七载有才宽、张泰、邓璋、彭泽等数人。其中的杨一清、彭泽,均与蓝章私交甚好,杨一清至嘉靖四五年间曾再度出任此职;彭泽于正德七年即总制四川、湖广、陕西等处军务,是平定四川民众起义的主要领导者,正德九年八月起督理陕甘军务,在任期间有吐鲁番“速檀”满速儿侵占哈密之乱^③。则疑“番夷(或匈奴)入寇”时聘龙正“居帷幄”者,应是甘肃兰州人彭泽^④。据此则知,龙正是甘肃阶州(旧称武都,今属陇南市武都区)人,精于易学和占卜之术,长于兵法 and 著述,正德年间已以军事谋划才能而获陕西都御史赏识,曾入陕西三边总督幕府;然不乐仕进,屡征不就,以隐逸而终。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此二文所列龙正著作中,均有《八阵图》而无《八阵合变图说》,这应是该书并非龙正独撰的一个有力佐证。

其次,关于此书的成书过程,高刻本徐《叙》、蓝《跋》中均明确交代曰:

此吾东莱蓝公以大都宪典兵汉中之时,所以景慕诸葛武侯,遣使鱼复,图其犹在之垒石,而谛观之,加以推演,询问讲究之。久,一旦,恍然,似有以得其指要者。复得武都士人龙姓正名者,语练阵图,与语吻合,深加赏识。遂命取小石于厅事后,布以合之,起以变之,

① 许容等监修:乾隆《甘肃通志》卷三十九《隐逸》,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影印本,第3985页。

② 葛时政纂修:乾隆《直隶阶州志·人物·隐逸》,曾礼编:《阶州志集校笺注》,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29页。

③ 详可参阅田澍:《明代哈密危机述论》,田澍、李清凌主编:《西北史研究》(第三辑),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76—89页。

④ 彭泽生平,详可参阅张建魁编:《甘肃历代名人研究》,兰州:甘肃科学技术出版社,2015年,第231—232页。

其合其变,应手而成。于是,以其法教诸将士,验其可与有为也,遂著之图说。比旧加详,而摆阵变阵之举,发所未发也。

顷者,蜀盗弄兵,予奉诏致讨,督师驻汉中,因取八阵图而推演之。自六十四垒分内、外、前、后、四隅,又变而为八阵,纵横开阖,钩联蟠屈,各有条理。以之训练,而行伍始严整可观矣。三复考订,命武都人龙正图之而注其左,付郡守杨秉衡刻梓。^①

如前所述,蓝章于正德五年的官复原职、正德八年的因功而迁,均与四川民众起义有关。据载,为防止陕西民众的起而响应,蓝章于重获起用之初,即采取“浚洛丰之水,灌三州之田;筑兴平诸路墙,以防响马;益冬衣布花,以恤三边军士;开长安书院,课八郡诸生”^②等措施,努力改善陕西民众的生存环境。据此二文则知,为提高官军的实战能力,蓝章还在驻兵汉中之际,派人至四川鱼复(今重庆奉节)绘制诸葛武侯八阵遗迹图,并加推演,想出了可据以练兵的新八阵;然后招募“谙练阵图”的“武都人龙正”,命其将新八阵绘制成图、添加注语而成书,用于训练将士。则《八阵合变图说》的成书过程,应是先有蓝章的新八阵构想、继有龙正的据其意而绘图加注成书。

此外,今存“湖广提刑按察司按察使”李昆作于“正德八年六月望日”的《八阵合变图说序》(以下简称“李《序》”),亦载《八阵合变图说》成书过程曰:

近世兵法不讲,多事野战;虽名将帅,亦谓八阵无所施。向予以分巡汉中,领兵事;所谓龙正者,尝在幕下,亦数数言之。予虽深知其然,竟亦无所建明也。兹乃得都宪公用正,日演八阵合变之法以教将士,既精且熟,敌不敢近。乃以其法著之图说,明如指掌,端如贯珠,审如中鹄,使吾军威仪俨然,增泰山之重,所以缉熙王猷,大非演未。以此观之,则公今日奉命讨贼之心,岂待焉而已哉!秉衡,蜀之雋彦,其于武侯盖所钦慕。矧今正有都将之寄,而邻境复有枹鼓之急,此书之刻,同志可知。太史公有谓:“闾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云之士,恶能施于后世。”予于此又幸夫龙正者得因而显名于世云。^③

李昆(1471—1532)字承裕,号东冈,山东高密(明时属莱州府,今属潍坊市)人,明弘治三年(1490)进士,历礼部主事、解州知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等职,曾巡抚甘肃、顺天等地,嘉靖四年以兵部左侍郎致仕,事迹散见于《明武宗实录》《山东通志》《汉中府志》《高密县志》《高密李氏家谱》等。此序提及的“分巡汉中,领兵事”,当指他于正德六年(1511)二月升为陕西提刑按察司副使、分巡关南兵备道一事;其时,陕西关南兵备道直辖汉中郡,驻地就在汉中。因知喜谈诸葛八阵之事的龙正,至迟于正德六年已进入陕西汉中官军“幕下”,至正德七年乃得蓝章重用而编成《八阵合变图说》一书,从而得以“因而显名于世”。

① 贵州省图藏本未见全书,此据国家图书馆藏本著录。

② 赵京仕:《重修先侍郎公(蓝章)汉中生祠碑记》,蓝润辑:《余泽录》卷二,国家图书馆藏清顺治十六年(1659)即墨蓝氏家刻本(善本书号:02433)。

③ 李昆:《八阵合变图说序》,蓝润辑:《余泽录》卷二。

由上可知,《八阵合变图说》的成书,源于陕西巡抚蓝章的借诸葛八阵之法而练兵备战意图;其成书过程,则是先有蓝章由旧八阵推演而出的新八阵,继有龙正的受命据意绘图加注;其成书时间,应在蓝章驻师汉中、并聘龙正入其幕下的正德七年至其蓝《跋》完成的正德八年五月间。而其性质,若套用2010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六条,则可视作蓝章和龙正二人均享有署名权的“职务作品”:蓝章的享有署名权,在于提供了全书的编撰思路;龙正的享有署名权,在于按蓝氏思路绘制新八阵图并添加文字说明。因此,此书的撰者信息,应或如高刻本一样,标作“明即墨蓝章学武都龙正参”;或如现代学者王澄一样,标作“明蓝章撰,龙正演注”^①。

(二)初刊地考

《八阵合变图说》最早刻本的刊刻,前引蓝《跋》仅称“付郡守杨秉衡刻梓”,李《序》所载亦寥寥:“汉中守杨君秉衡以状抵予曰:‘顷者,巡抚大都宪蓝公(章)命士人龙正演注《八阵合变图说》成,既自跋之矣,付走将刻之梓,亦盛举也,乞为序之。’”因据相关文献略作推考。

杨秉衡即时任汉中郡守者的杨一钧(1476—1535?),字秉衡,四川邻水人,弘治十五年(1502)进士;正德中,以户部郎中知汉中府,从容筹划因四川民乱而驻扎于汉中的官军给养,民赖以安;后,迁浙江提刑按察司副使,事迹散见于雍正《陕西通志》卷五十二、雍正《四川通志》卷八、乾隆《邻水县志》卷三等。不过,杨一钧虽是四川人,其刊刻《八阵合变图说》一事,实当发生于“汉中”而非“蜀中”,依据有二:

一者,正德五年(1510)初至正德八年十二月间,四川全境陷入鄢本恕、蓝廷瑞、廖麻子、喻老人等人次第领导的起义之中,起义军并屡屡冲击毗邻的湖广、陕西等地,甚至于正德六年七月攻破陕西汉中郡略阳县城、俘杀奉命督修城池的原扶风县令孙玺^②,以致身为陕西巡抚的蓝章不得不亲自提兵驻扎于汉中。《八阵合变图说》的编写和刊刻目的,在于令将士“诵而习之”,以便据以训练、提高实战能力;其刊刻数量,蓝《跋》载为“自将领以至士卒,人给一本”。而其时,蓝章所率驻扎汉中的官军数量虽已无考,然正德六七年间转战汉中的廖、喻起义军曾号称20万众;则用以防御的陕西官军之数,至少当在一二万人。《八阵合变图说》虽寥寥数页,然要刻版、印刷、搬运一二万册,其工不可谓易。值此之际,杨一钧不应费时费力且涉险地远至民众起义中心的四川去刻一部陕西官军急用的兵书。

二者,蜀地刻书之名虽盛于宋,然至有明一代,其势已远逊于陕。如胡应麟(1551—1602)《少室山房笔丛》载曰:“凡刻之地有三,吴也、越也、闽也。蜀本宋最称善,近世甚希。燕、粤、秦、楚今皆有刻,类自可观,而不若三方之盛。”^③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进士周弘祖所编《古今书刻》中,录明代四川官刻精本仅68种,陕西官刻精本则达109种,其中汉中府刻即有9种^④。另如今存《史记集解索引正义》的最早刻本,即是正德十一年(1516)由曾任陕西监军太监的廖堂之侄廖铠刻于陕西^⑤。由此3例可知,明正德年间的陕西刻书业,虽不如吴、闽、越之盛,然已后来居上,超越蜀地。则身为陕西汉中

① 王澄编:《扬州刻书考》,扬州:广陵书社,2003年,第12页。

② 详可参阅崔铤:《知县赠少卿孙公玺墓表》,焦闳编:《献征录》卷九十四,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7年,第4126页下至4127页上。

③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四,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第43页。

④ 高儒等著:《百川书志 古今书刻》,北京: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第380—386页。

⑤ 北京图书馆编:《中国版刻图录》,北京:文物出版社,1961年,第391—392页。

郡守的杨一钧,显然也不应舍好求次地派人到蜀地去印书。

据此二点,知该书的初刊地应为陕西“汉中”而非“蜀中”。而四库馆臣的“蜀中”之讹,或源于其以蓝章为“巡抚四川”之误及汉中旧隶四川、元时始划归陕西的历史沿革。

此外,据今存蓝《跋》、李《序》,疑该初刊本前有李《序》;惜初刊数量虽多,然不久即散佚无存,今已无从可考。而其散佚原因,或当如现代藏书家黄裳在国图藏高刻本所留“庚寅正月十八日”题记中所说:

意此书前日多以颁给将士,人手一册,俾资诵习。纸用厚棉料,所以求其耐久也;草草订册,不加前页,初无珍视之意。而其书亦如军书露布,遂归湮灭。

其初刊本“草草订册”“初无珍视之意”的“军书露布”本质,确应是其于战乱平息后迅速散佚之主因。值得注意的是,明正德间进士张岳(1492—1553)曾提及另一种“军书露布”式的《八阵合变图说》:

《鱼腹阵图》,世多有,而演绎翻变,以求合于天地、风云、龙虎、鸟蛇之说,某所见者,凡数家,为法各异。嘉靖己亥夏六月,侍御湛塘王君奉玺书清戎两浙,出其《八阵合变图说》,以示藩臬诸司。盖取故都宪东莱蓝公旧本,稍为订定发挥。前此谭八阵,未有能及之者。……侍御君既叙其意,命刊布诸武官,使各以是法训练,而某特为推其法之所从来者如此。若夫分合奇正之变,则本图说尽矣,兹故弗及云。^①

“嘉靖己亥”即嘉靖十八年(1539),其时“奉玺书清戎两浙”的“湛塘王君”,即时任两浙“清军御史”的王献芝。王献芝(1500—?)字德仁,号湛塘,徽州府歙县(今安徽歙县)人,寄居两淮,嘉靖十一年(1532)进士,历南京监察御史、南京户部主事等职;性喜藏书,藏书室名东皋草堂,著有《宪台法评》《八阵合变图说》等,事迹散见于《明实录·世宗实录》《江南通志》等。王献芝籍隶徽州,寄居两淮,且屡任职于蓝章曾出任刑部右侍郎的南京,兼喜藏书,自当有收藏“都宪东莱蓝公旧本”《八阵合变图说》的可能。此“旧本”,当是明正德十一年(1516)“两淮运司”高朝用奉命重刊之本。而时仅23年之后,王献芝即对蓝章“旧本”再加“订定发挥”以进,并获“刊布诸武官,使各以是法训练”之命;则蓝章、龙正所创新八阵之法的实战功效,由此可见一二。然王氏重订之本亦如杨秉衡初刻于汉中者一样,早已荡然无存,则其极可能也是“草草订册”的“军书露布”。

二、版本辨

关于《八阵合变图说》的版本,《四库全书总目》仅曰“无卷数,两淮盐政采进本”;《四库采进书

^① 张岳:《八阵合变图说序》,张岳著,林海权、徐启庭点校:《小山类稿》卷十一,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07—208页。

目》“两淮盐政李续”呈进书目中,亦仅著录作“《八阵合变图说》一卷,明龙正撰,一本”^①。而《中国兵书通览》载,该书今存之本有“明正德十一年蓝章高朝用刻本,明正德十一年蓝章高朝用刻重修本,学津讨原(嘉庆本、景嘉庆本)第十集,丛书集成初编·社会科学类”,以及黄邦彦刻“蜀诸葛亮撰”《心书》所附《八阵合变图说》一卷本等^②。综考今存各本,知其可大致划分为三个系统:

(一)明正德十一年高朝用刻本

如前所述,高刻本是今存《八阵合变图说》的最早刻本,且有多家藏本。其前为徐《叙》,文后有徐氏署名及“文举”“丙辰进士”二印;继以著录书名、撰者、目录信息的一翻二页,继以正文和蓝《跋》。正文分八阵号令、八阵图说、天覆阵图说、地载阵图说、风扬阵图说、云垂阵图说、龙飞阵图说、虎翼阵图说、鸟翔阵图说、蛇蟠阵图说等10部分,“图说”部分均先图后说;蓝《跋》末有蓝氏署名及“劳山翁”“文绣”“御史中丞”三印。全书字体一致,皆为出自一人的刻版体。

令人疑惑的是,高刻本正文皆加旧式句读,徐《叙》、蓝《跋》却无;且徐《叙》云此乃“翻刊原本”,即其底本应是正德七八年间杨秉衡初刊于汉中者,然此本因何弃去前述李《序》而换用徐氏新撰之《叙》?或初刊汉中之本原未刻入李《序》、蓝《跋》,而高朝用“翻刊”时不知有李《序》之事?此已无从可考,唯从徐《叙》可推知高刻本之一二:

今公以少司寇兼都宪清理两淮等处盐法,而士大夫之道经者咨访阵图之说,往过来续,烦于应酬。爰命两淮运司同知高君朝用翻刊原本,冀代应酬,且广其传。君承命,偕其僚佐,属叙于余。余虽不佞,而稔闻“汉中之功,成于阵图之习;阵图之习,成于蓝公之教”,而亟美其人存政举也,是用不辞,而次第其概如右以复。

据史籍,“高君朝用”乃陕西高陵(今西安市高陵区)人高选。高选字朝用,号渭坡,弘治六年(1493)进士,历户部云南司主事、河南钧州府同知、吉州知府、清州知府等职;至正德十年,始因蓝章举荐而迁两淮盐运司同知,为官清廉刚正,卒于任所,贫不能归葬,民为立去思碑,事迹散见于雍正《陕西通志》卷五七、《高陵县志·人物志》、韩邦《苑洛集》卷一九《祭高运同朝用文》等。由徐《叙》可知,蓝章奉命清理两淮等处盐法时,烦于道经两淮运司的达官贵人们对诸葛八阵之事的好奇,因命时为其下属的高朝用负责翻刻此本。

其“翻刊”本意,既在赠与“士大夫之道经者”“冀代应酬,且广其传”,则其雕版、用纸、装帧等必应竭尽其时其地之能,远非汉中初刊者所能媲美。该本因得以递藏至今,并被现代学者归入明代“官刻本”之列^③,惜其至今并无正式流通本。不过,一向视蓝章及其著述为家族荣光之一的即墨蓝氏后人,不仅世代收藏此本,且曾多次自行刊印。这种流通范围相对较狭的即墨蓝氏家刻本^④,显然源自

① 吴慰祖校订:《四库采进书目》,北京:商务印书馆,1930年,第65页。

② 许保林:《中国兵书通览》,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2年,第554、458页。

③ 王澄编著:《扬州刻书考》,扬州:广陵书社,2003年,第12页。

④ 其流通不广的主观因素,或与蓝章长子蓝田嘉靖年间的两下大狱及即墨蓝氏后人的仕途不显有关。详可参阅潘文竹:《蓝氏家族文化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

正德十一年的高刻本。

(二) 明万历间黄邦彦刻《诸葛武侯心书》本

《诸葛武侯心书》，又简称《心书》，也称《新书》或《武侯新书》，相传为诸葛亮撰，今存刻本较多，如仅题作“心书”者，明代即有黄邦彦、韩袭芳、书林郑少斋、吴善翊等多人刻本。其中，黄邦彦刻本计2册，前有“弘治三年（1490）孟冬既望”夔州知州刘让《序》，上册收诸葛亮文60篇，下册即《八阵合变图说》（以下简称黄刻本）。今中国国家图书馆有藏本，善本书号为05024。相比于高刻本，黄刻本前增八阵遗迹图二，脱著录书名、著者、目录的一翻二页，后增撰时不明的黄邦彦《书武侯心书后》一跋。黄邦彦字治徵，四川新都（今四川成都）人，明万历（1572—1620）间刻书家，于万历八年（1580）校刻《孙子集注》十三卷^①、十七年校刻《孙武子纂注》《诗林广记》等，其它不详。对此书的刊刻目的，黄氏跋文称：

百世之下若神交心契于侯者，无能起侯于九原而接其论议，是以即其书疏、阵图梓之以贻后世，俾藉其书想见其为人，以得其心于言词之外，而因知其平生之大致，是刻心意也。^②

这里的“阵图”，显然指《心书》下册所录之本，因知黄氏误以此书为诸葛武侯原作。然黄氏虽误，《八阵合变图说》一书却赖此而保存了高刻之外又一个至为完善之本。与高刻本相比，黄刻本有两处明显不同：一是内容上，八大变阵的“图”与“说”之间，各增四言八句式的“赞”语部分；二是字体上，徐《叙》显系手写体，蓝《跋》虽为刻版体，然亦迥异于正文字体，保留了与今存崂山题刻中蓝章手书遗迹^③一致的手书风格。

据此，则疑黄刻之底本，当即《中国兵书通览》所谓“明正德十一年蓝章高朝用刻重修本”，甚或乃此“重修本”的“底本”；惜年湮代远，今已无从考知。而今之流通本中，有两种当属黄刻本系统：一是《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其子部第30册第806至822页即据黄刻本影印此书，后附《〈四库全书总目·八阵合变图说无卷数〉提要》；二是《续修四库全书》本，其第959册第210至225页亦据黄刻本影印。然此二种，均袭四库馆臣之讹而将著者署作“明龙正撰”。

(三) 清嘉庆间张海鹏校刻《学津讨原》本

张海鹏（1755—1816），字若云，号子瑜，初名荣基，江苏常熟人；好藏书，精校勘，与父张仁济、兄张光基、侄张金吾等均为知名藏书家、刻书家，一生校刻有《学津讨原》《墨海金壶》《借月山房汇钞》等多种丛书。《学津讨原》乃张氏以其藏书楼——照旷阁之名校刻的首部丛书，共20集，收书173种1051卷。今国家图书馆藏有清嘉庆十年（1805）^④张氏照旷阁刻本一套，计282册，其第142册第52—72页即为该书（以下简称张刻本）。

与高刻本相比，张刻本主要有两处不同。一是著者与书名不同，著者署作“明龙正撰 昭文张海鹏

① 杨绳信编：《中国版刻综录》，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59页。

② 《诸葛武侯心书》，国家图书馆藏明黄邦彦刻本（善本书号：05024）；又见于《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30册，第821页。

③ 青岛市崂山风景区管理局、青岛市崂山区文化新闻出版局编：《崂山摩崖集萃 华楼篇》，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96页。

④ 此刊刻时间乃国家图书馆认定，然其第一集第1册卷首劳树棠序后署作“嘉庆十一年岁次丙寅九月重阳后三日”。

订”,书名题作“八阵图合变说”。二是内容有所增删,前增《四库全书提要·八阵合变图说提要》,徐《叙》、正文、蓝《跋》则有删改。不仅删除了徐《叙》中“复得武都士人龙姓正名者”“遂著之图说”“惜其刊于汉中者”等交代成书及翻刊过程的语段,且将正文次序调整为先八阵总说、再八阵号令、继八阵总图,又对蓝《跋》正文、蓝氏署名、印鉴等加以删改。下引两段分别据国图藏高刻本、张刻本蓝《跋》校录的文字:

三复考订,命武都人龙正图之而注其左,付郡守杨秉衡刻梓。自将领以至士卒,人给一本,诵而习之。呜呼!废阵形而用兵者,妄也;执阵形而求胜者,愚也。平居练兵,如身运臂而臂运指,无不如意,则御寇而转击焉,一阴一阳,变化出没,而莫有逆吾命者矣。孙武曰:斗乱而不可乱,形圆而不可破。非武侯之图,其孰能与于此哉!

三复考订,遂图注于左,以为秘密。呜呼!废阵形而用兵者,妄也;执阵形而求胜者,愚也。平居练兵,如身运臂,如臂使指,随机取胜,应敌无方,是在于神而明之也。

据此可推知,张刻本对蓝《跋》的删改,似是有意抹除蓝章与该书之关系。然此删改,或非始于张氏。一者,张氏《学津讨原·凡例》第6条明确述称对“是编所辑”之书“无一删节”:“是编所辑,皆购原书,无一删节;有其书久佚,经后人搜采重辑,残玕断璧,弥为可贵,间存一二,不在此例。”二者,张氏《凡例》第2条明确交代各书均源于《四库全书》:“是编所收,皆《四库全书》著录有关经史实学及朝章典故、遗闻轶事。”丛书卷首所收劳树棠《学津讨原序》亦曰:“张君因毛刻(即《津逮秘书》)损益之而去取及增入者,一以《四库》所收录者为主;又广购善本,详为校核,合一千四十余卷,编成二十集。是较《津逮》而又为精贍矣。”劳树棠(1730—1816)字宝琳,号镜浦,山东阳信人,清乾隆四十九年(1784)进士,曾协助纪昀编撰《四库全书总目·医家类》^①;则其所谓张刻各书“一以四库所收录者为主”,当非虚语。综此,张刻本之底本,无疑当与四库馆臣所见“两淮盐政李续”呈进之本同源。其撰者和书名信息、文本内容等的删改,亦当与“两淮盐政”密切相关,惜今已无从可考。

今天的流通本中,有三种同属张刻本系统。一是商务印书馆1935至1937年间出版的《丛书集成初编》本,其第957册有“据学津讨原本排印”的该书。二是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年发行《丛书集成新编》本,其第32册第575至579页即为该书;虽未标版本来源,但内容、版式一仍《丛书集成初编》本。三是解放军出版社、辽沈书社1987年联合发行的《中国兵书集成》本,其第40册第22至40页“据清嘉庆张海鹏辑刊学津探原本影印”该书;然其《编辑说明》不加详考,仅据已被删改之徐《叙》、蓝《跋》而产生龙正“于正德间,巡抚四川,遣人至鱼复江,图八阵垒石,推演为图说”^②的新讹误。

今存《八阵合变图说》的三个明清刻本,存有多方面的明显不同。一是署名上,高刻本署作“明即墨蓝章学武都龙正参”,黄刻本未署名,张刻本署作“明龙正撰”。二是内容上,与高刻本相比,黄刻本八变阵的“图”与“说”之间新增撰者不详的四言八句式“赞”语,张刻本则颠倒了“八阵号令”与“八

① 详可参阅杨东方、李柳骥:《劳树棠与〈四库全书总目·医家类〉》,《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2011年第3期。

② 《中国兵书集成》编辑部:《中国兵书集成第四十册编辑说明》,《中国兵书集成》编委会编:《中国兵书集成》第40册,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第1页。

阵图说”的次序,并对徐《叙》、蓝《跋》有所删改。三是版式上,高刻本、张刻本均为全书一致的刻版体,黄刻本则徐《叙》为手写体,正文为刻版体,且异于蓝《跋》的手书刻版体。四是流通上,高刻本仅见于各藏书机构和即墨蓝氏家族,黄刻本、张刻本则有多种现代流通本。

而综合以上信息可以确知,该书是即墨蓝章巡抚陕西、驻兵汉中时,据诸葛八阵遗迹自行推演出八变阵后,又命武都士人龙正据其意绘图加注编而成书的;其撰者信息,当如高刻本一样,署作“明即墨蓝章学 武都龙正参”。然自高刻本刊行以来,其撰者信息不知因何先后发生了两次比较明显的讹变。首先是明末清初的书目中,出现了蓝章、龙正分署二书的现象。如焦竑(1540—1620)编《国史经籍志》卷四下“子类·兵家·营阵”中,著录曰:“《八阵合变图说》一卷(雷辰化)。《八阵图演注》一卷(龙正)。”^①黄虞稷(1629—1691)《千顷堂书目》卷十三录曰:“蓝章《八阵合变图说》一卷(东莱人。一作雷震北)。龙正《八阵图演注》一卷。”^②清雍正十三年(1735)告竣的《明史·艺文志》子部兵家类中,则仅著录“龙正《八阵图演注》一卷”^③。其次自清乾隆中期广征文献、汇纂《四库全书》以来,《八阵图演注》一书之名渐失;而在《续通志》《四库全书总目》《四库采进书目》等书目以及《学津讨原》《丛书集成》《中国兵书集成》《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等古今丛刻中,其著者信息直接讹变为“明龙正撰”。其讹变之因,今已不得而知;然对其讹变,当正而广之,以免继续贻误后人。

责任编辑:冯济平

Textual Research on *Illustrated Explanation of the Combin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Eight Battle Arrays*

PAN Wen-zhu

(Advanced Institute of Confucianism,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100, China)

Abstract: *Illustrated Explanation of the Combin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Eight Battle Arrays* is a book on war written in the Zhengde period of the Ming dynasty expounding Zhuge Liang's eight battle arrays, which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when Shaanxi officers and armies suppressed the popular uprising in Sichuan. Examining the existing documents shows that the book is a “work for duty” by Lan Zhang, then governor of Shaanxi from Jimo, Shandong in cooperation with his counsellor Long Zheng, a native of Wudu, Gansu province. It should have borne the names of both Lan Zhang and Long Zheng. It was first published in Hanzhong, Shaanxi rather than Shuzhong, Sichuan through the hands of Yang Bingheng, who was then chief of Hanzhong from Linshui, Sichuan. Nowadays, *Illustrated Explanation of the Combin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Eight Battle Arrays* exists in three versions of block prints respectively by Gao Chaoyong, Huang Bangyan and Zhang Haipeng.

Key words: *The Overall Index of the Si Ku Quan Shu; Illustrated Explanation of the Combin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Eight Battle Arrays*; Lan Zhang; Long Zheng; edition

①《明史艺文志·明史艺文志补编·明史艺文志附编》,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1031页。

②黄虞稷撰,瞿凤起、潘景郑整理:《千顷堂书目》(附索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354页。

③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九十八,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437页。